

| 奥登文集 |

[英] W. H. 奥登 著 马鸣谦 蔡海燕 译 王家新 校

奥登诗选：1927—1947

COLLECTED POEMS

W. H. Aud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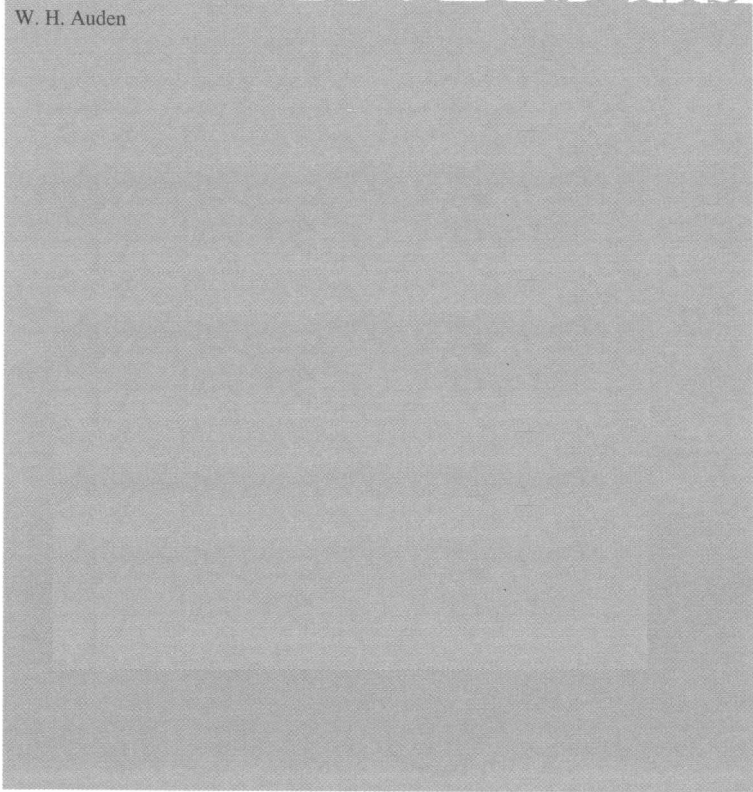
| 奥登文集 |

〔英〕W.H. 奥登 著 马鸣谦 蔡海燕 译 王家新 校

奥登诗选：1927—1947

COLLECTED POEMS

W. H. Aud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登诗选: 1927~1947/(英) 奥登(Auden, W. H.)

著; 马鸣谦, 蔡海燕译; 王家新校. —上海: 上海译

文出版社, 2014. 5

(奥登文集)

书名原文: Collected Poems

ISBN 978-7-5327-6419-8

I. ①奥… II. ①奥… ②马… ③蔡… ④王… III.

①诗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457 号



图字: 09-2010-115 号

奥登诗选: 1927—1947

[英] W. H. 奥登 著 马鸣谦 蔡海燕 译 王家新 校

策 划/黄昱宁 责任编辑/顾 真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 插页 8 字数 229,00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6419-8/I·3839

定价: 8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
为《奥登诗选：1927—1947》所写的前言**

爱德华·门德尔松

奥登精于描绘二十世纪的历史和他个人的情感史，两者常常出现在同一首诗歌中。这部诗集遴选了他创作生涯前半期的诗作，大致写于他二十岁至四十岁期间。奥登最早期的作品多是表现因家庭、过往经历或爱的可能性而产生的自我疏离感，同时也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体彼此隔绝的困境，无论如何，凝聚人类群体的那些传统纽带已然断裂了。

此后的三十年代，奥登变得更为自信与成熟，与此同时，欧洲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大萧条；他的诗作对个人情爱更确定了些，也开始探索社会变化的可能性，要么经由某种变革，要么通过内在的“心灵转变”。

在1939年至1945年间，奥登的诗歌变得趋于悲观，即便抒写相爱的忠诚，也暗含了个体和国家的负罪感，意在揭示同时摧毁了私人生活和国际环境的毁灭性错误。这部选集的后半部，在1945年之后的作品中，奥登逐渐看到了某种重生的希望：身心的分裂仍可弥合，国家与人民之间仍有可能连结为一体。

奥登1907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公共健康领域的教授，母亲则是一位专职护士，他是家中的第三子。奥登的语言和视野总带有某种“科学”色彩，更多基于显在的事实而非一厢情愿的想象，但他首先还是一个有“爱”的诗人，总在关注对爱的圆满实现产生阻碍的因素，无论它是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出于内在的焦虑。

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英语诗人中，奥登对情感和道德的经验作出了最为广阔的回应，在修辞和风格方面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当他写出“若有可能，愿成为大西洋的小歌德”这样自我期许的诗句时，奥登提到了歌德，在莎士比亚之后的欧洲诗人中，惟有歌德才在广度和深度上令他钦敬与追摹。奥登擅写动人的谣曲、讽刺性的双韵体、格言体谜语诗，也能处理滑稽歌曲、圣诞歌曲，有对风景和历史的沉思，也有表现主义的文字游戏，战时他会在酒吧里写巴洛克风格的田园诗，也会写讽刺性的祈祷文和政治短文。此外，他也能娴熟驾驭五行打油诗、和歌、散文诗和十四行诗等各种诗体，而且，总会在语调和文体上创新出奇；而他的爱情诗包含了渴望、失意、狂喜、厌倦、亲密、疏离与挫败等诸般复杂的感受。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曾这么写道：“对我这样的诗人来说，自传是多余的，因为不管如何隐晦，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重要事情都会含摄在一首诗作里。”

奥登在这封信里提及的“隐晦”并非意指“表达之隐晦”，相反，他将此种做法视为文学与道德上的缺陷。他在诗作中加以掩饰的东西，有时恰是激发他投入写作的某个实在经验，时隔多年之后，他常会不辞烦劳地以散文形式再作确认。譬如《夏夜》一诗，写成三十年后他曾特意撰文，婉转而明确地阐明这首诗的创作触因是“大爱的想象”^①；某天晚上奥登曾和三个朋友一起闲坐（他们都是一所英国学校^②的教师），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确切无疑地认识到……所谓‘爱邻人如己’的真实含义”。这篇文章也间接透露了另外的讯息，奥登写于1939年的幻想性情

① “大爱”的原文 Agape，为希腊文《圣经》形容仁慈与爱的专有词汇。

② 从1930年到1935年，奥登曾做过五年的教师，前两年在苏格兰海伦堡的拉奇菲尔德学院，后三年在赫利福德郡的道恩斯中学（即此处提到的学校）。

诗《先知们》、《有如天命》、《预言者》、《重要约会》都曾受到他所称的“厄洛斯幻念”的激发，某种突如其来的“启示”，“照亮了个体的人。”

在其他的诗作中，奥登回应了外部世界的一些公共事件，其个人观感多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经验，而非诉诸笼统的半官方声明。1938年奥登在战时中国的旅行催生了一组十四行组诗，他的如椽巨笔同时描绘了宏观的历史变迁和转瞬的地方性事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收入这本诗选的下半部），《城市的悼念》写于1945年在战后废墟般的德国旅行期间，它唤起了奥登对历史和宗教的省思；而冷战期间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语言和思想的扭曲，则催生了《祷告时刻》、《阿基里斯之盾》、《基希施泰滕的圣临节》。

奥登私下里很清楚自己的名望地位，但他很谨慎，一直避免公开发表那种泛泛而谈的个人主张（某些听信表面言辞的批评家就此将他贬为次要的诗人，却让那些善于自我鼓吹者暴得大名）。他将W. B. 叶芝和T. S. 艾略特这些现代主义文学前辈奉为开创新范式的勇敢拓荒者，而将自己和同时代人描述为继承其历史遗产的守成者。他并没有明确地予以说明——但在诗作中曾一再暗示：相比开拓者，守成者的工作在道德上更为复杂，而在美学上要更为深刻。他有时会自称为喜剧诗人，这再次误导了读者，让他们天真地以为他只期望在文学史上占得一个次要地位；但他的诗文也强调了如下事实：在古典时代，喜剧性作品似乎不及悲剧性作品来得深刻，而对现代作家来说，因为普遍轻视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关于平等和爱的想象，喜剧要比悲剧来得更伟大。奥登的早期作品呼应了但丁《神曲》中普遍存在的喜剧想象，中年期的作品暗合了莎士比亚传奇作品中的神秘喜剧想象，而他的后期作品则让人联想到歌德那种恢宏而连贯的想象。

奥登的诗作经由喜剧化方式揭示了深刻的真理，因为采用任何其他方式都有可能毁于浮夸。一首诗，倘若以“让时钟全都停摆/把电话线拔掉”^①起句，是以喜剧性的夸张方式来表达深沉的情感，因为深沉的情感总是夸张而极端的，而就效果而言，一首喜剧性的诗要比一首故作正经的诗更具感染力。

奥登对英语语言的热爱始终不渝。他有意识地使用了几乎不可传译的词汇和修辞效果。此外，终其一生，他对整个的英语诗歌史都兴趣盎然，囊括了主流与非主流的作品：从《贝奥武夫》的匿名诗人，朗兰德，弥尔顿，德莱顿，蒲柏，拜伦，温斯洛普·麦克沃思·普雷德，狄金森，丁尼生，霍普金斯和格雷夫斯，直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有这些诗人——包括除此以外的很多诗人——他都曾在自己的诗作中予以呼应和模仿。他曾这么写过：人类这个物种之所以最为聪慧，全因其最温情仁爱能表达感情。而他的诗歌，已为智慧与爱之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完美见证。

① 《葬礼蓝调》一诗的起句行。

译者序

威斯坦·休·奥登 (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 诗作丰厚, 诗艺纯熟, 诗路开阔, 被公认为继 T.S. 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他的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 (Edward Mendelson) 说“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当中, 真正属于二十世纪的, 奥登是第一人”, 而诗人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 更充满敬意地称奥登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 是二十世纪的“批判者”。

—

在奥登的中文版传记问世之前, 不妨简略追溯一下他的早年家庭生活与他的诗文创作之间存有的联系, 以便读者对其人其文有一个初步理解的方向。

奥登 1907 年出生于英国北部的约克, 他的父亲乔治·奥古斯特·奥登是一名医生, 母亲康斯坦丝·罗萨莉·奥登是一名护士, 祖父辈都是英国国教会牧师; 这是一个盎格鲁-天主教家庭, 奉行某种融合了罗马天主教教义和仪式的圣公会信仰。为此, 奥登不止一次将自己对语言和音乐的热爱部分地归结于童年时的教堂礼拜; 他的青年时期, 自然曾受到当时种种现代思潮的影响, 然而, 由宗教熏染出的底色其实一直潜藏在他的人生选择中; 从西班牙内战爆发至他移居美国前后, 这个思想脉络愈见分明, 在他中后期的生活和创作中更成为了主导因素之一; 细读奥登的诗文, 我们很快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特质。当然, 他所秉持的原教旨理念, 更准确的说法, 是基于基督信仰的某种文明史观。

奥登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 (都是男孩), 也是最小的一个。他

曾写道：“我终究是最幸运的一个，无忧无虑的、备受宠爱的第三子。”他还以童话故事类比自己在三兄弟中的位置：在童话故事里，往往是老幺探险成功、赢得奖赏。而对奥登来说，母亲在他成长过程中的影响非常大：他的“成功”和“奖赏”就是为了赢得母亲的爱。自出生那一刻起，奥登就与母亲很亲近：一来作为最小的孩子，他一直都由母亲亲手抚养；二来是因为他与两位哥哥年龄相差了几岁，他们更喜欢把他留给母亲，然后自己跑出去玩。奥登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但他后来渐渐意识到，这样的亲密关系也带给他心灵的煎熬。他觉得自己成年后的某些习性与母亲息息相关：举止笨拙，这是因为母亲过早地开发了他的智力；同性恋倾向，这是因为母亲与他过分亲近，以至于他在成长过程中无意识地向母亲的性别靠拢；偏好音乐，这是因为母亲热爱音乐，鼓励他学习钢琴，还经常与他对唱名曲（比如瓦格纳的名曲《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值得注意的是，她让奥登演唱的是其中女主角伊索尔德的歌词）。奥登的这番自我认识，无疑是可信的，他一生都没有摆脱母亲对他造成的影响。这个影响当然也会表现在创作中。他的诗作中就经常出现女性压迫者的形象，如《家族幽灵》里“要征服她，那看得见的敌人”中的“她”；或者如“断奶”这样的词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婴儿“断奶”对人的后期人格和心理结构的形成非常重要），在那首《1929》中，就有这样的段落：

只因独自一人，惊恐的灵魂
返回了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
却没有归属感：每过一个小时
他都渐行渐远，也必得如此，
如断了奶的孩子走出家门，
踉跄着刚走几步路，就焦急万分，

欢喜雀跃只为找到自己的家，一个
呆在那里无须征税的所在。

这种因为与母亲的过分亲近而产生的焦虑，在如下几行诗里有着更为明确的表现：“汤米按照母亲的意愿行事 / 直到心灵再也无法承受； / 他的思维一半是天使 / 另一半却是狗屎。”

另一方面，父亲对他施加了另一层面的影响，令奥登从小就迷上了神话、传说和各种奇思异想。在他还不会阅读的时候，深谙古典文学的父亲就常常给奥登讲述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以及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也讲述其他神话人物，比如雷神托尔、火神洛基等冰岛神话谱系的神灵们。奥登医生尤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了解后者，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非常热衷于北欧古代文化，还因为他觉得家族姓氏“奥登”来源于冰岛（长大成人后的奥登很快就安排了一次冰岛寻根之旅，写下了诗歌《冰岛之旅》）。

奥登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另外一些东西。他父亲曾就学于剑桥大学自然科学专业，毕业后做了医生；他不但重视医学实践与历史，还注重医学的哲理成分，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也颇有研究；他喜欢引用一句话——医生应该“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病人，而不是对方所患疾病的特殊方面”；他经常对小奥登说：“治疗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存在于神奇大自然中的直觉艺术。”这些话深深地烙印在奥登心中，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早熟的奥登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学家式的冷静、客观的分析态度。六岁时他曾断言：“我所接触的大多数成年人都很愚蠢。”而他对阿姨们的评价是“性格急躁，为人慷慨，体质较弱，有些神经质”。通过日常的交往和观察，他逐渐认识到“疾病可能由身心失调引起”，虽然他当时还不会用诸如“身心失调”之类的复杂字眼，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青年奥登在欧洲游历期间结识了美国心理学家霍默·莱恩

(Homer Lane)，进一步确立了他对疾病的精神分析的态度：他觉得一个人得皮肤病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肉体存有偏见；腹泻和呕吐可能源于他对过去心存阴影；衣修伍德 (Christopher Isherwood) 的咽喉痛是因为说了谎；斯彭德 (Stephen Spender) 长得高是想“步入天堂”；而他对自己的肠裂问题的解释是同性恋倾向……奥登对疾病的这种分析，偶合了苏珊·桑塔格所批评的“疾病是人格之表达”的观点：“人格可以诱发疾病——这是因为，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奥登的疾病观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对现代人精神异化所导致的病态后果的认识。他的诗歌《维克多》和《吉小姐》便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前者体现了自我压抑所导致的心理疾病，而后者表现了自我压抑所导致的生理疾病。

自然环境亦是奥登精神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家乡毗邻奔宁山脉，他从小就接触了很多废弃的矿场和矿井。在没有写下诗行前的孩童时期，他曾幻想自己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下面这段话是他对这份幻想的描述：“醒着的时候，我常常在心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神圣世界。它的基本要素是一片北方的陆地，那里有石灰石、工业设施和铅矿。”小奥登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幻想世界，他一直让母亲和其他长辈帮他寻找诸如《金属矿机械》之类的书籍，还有与之相关的地图、旅行手册和图片，尤其喜欢关于矿业、矿脉或地质学的专业术语；一逮到机会，他就会说服他们带他去参观那些真正的矿场。长辈们据此推断奥登天性喜好科学，有成为矿业工程师的天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奥登在机械操作方面的能力很匮乏，无论他看起来对矿业多么感兴趣，那也与专业门类的科学无关，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喜爱。机械、隧道、地质学知识……奥登对这些词汇如此着迷，因为它们似乎蕴藏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象征意义。他后来回忆说：“在我看来，一个像‘pyrites’

(硫化铁矿)这样的术语并不仅仅是一个指示符号，它还是一个神圣事物的固有名称。所以，当我听到一位阿姨将它念成‘pirrits’时，我惊恐万分……无知是一种亵渎。”

正是在这份痴迷的牵引下，奥登此后走上了一条远离现成范式的诗歌道路。凭借独特的个人体验，他自信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同时对词汇和象征感兴趣，那么他必然会成长为诗人。”检视奥登少年时期的诗歌习作，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很多直接与矿井相关的地名、术语和事件，比如《旧时的铅矿》、《矿工的妻子》、《铅是最好的东西》等；进入诗歌创作的成熟期后，专门写矿产工业的诗篇虽然不多见了，但矿井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意象，我们在《预言者》、《新年书简》、《石灰石颂》、《六十岁的序言》等诗歌里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迹。

二

十五岁那年夏天，奥登初涉诗歌领域，一度师法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手法，而时隔四年之后，他兴奋地对自己的导师说：“我最近一直在阅读艾略特的作品……现在，我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了……”

T.S.艾略特的荒原意象如启示的路标，指引了奥登深入体察现实生活，使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非“左”即“右”的时代大背景下，以其对现代弊病的剖析、对政治事务的热忱和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创作出一系列富有感染力和时代新意的诗篇，因而被定义为了“左翼诗人”。但奥登的诗歌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多种思想的复杂意涵，并不能简单粗糙地用“左翼文学”一词来做笼统的概括。

英国诗人兼文学批评家格里格森 (Geoffrey Grigson) 曾如此评价奥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语诗坛的境况——“奥登是个庞然

怪物”：

奥登从不随波逐流。奥登并不温文尔雅。无论是在创作还是生活上，奥登都不落窠臼。他不走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路子，不沿袭汉普斯特德文化圈的传统，也不依循牛津、剑桥或者拉塞尔广场那些人的模式。奥登写尚在求学的少年。奥登时不时地咬手指甲。奥登写诗时会押韵。奥登信手拈来各种诗体。奥登并不讨厌豪斯曼（A. E. Housman）。奥登更接近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而不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奥登更喜欢杜米埃而不是蒙德里安。奥登更有可能阅读冰岛英雄传奇而不是《海浪》（*The Waves*）……

奥登是个庞然怪物。

“monster”既有“怪物”的意思，也有“庞然大物”的意思。虽然格里格森认为奥登的诗风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有“怪异”之嫌，但他基本上是以肯定的态度评价奥登的非同寻常之处，因而“monster”有了一层“庞然怪物”的含义。格里格森随后还为“庞然怪物”添加了一个形容词——“有能力的”（able），认为奥登是英语诗坛鲜见的“有能力的庞然怪物”。

另一方面，“庞然怪物”强调了体积的庞大，这也喻示了奥登在英语诗坛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刚走出牛津大学校园不久的奥登以左翼诗人的身份出场，为英语诗歌带来了新内容、新技巧和新方向，迅速奠定了自己在诗坛的地位，此后十年诗名煊赫，更成为了“奥登一代”的领袖人物。

然而，奥登的人生轨迹却在三十年代末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他选择了一条跟 T.S. 艾略特相反的道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定居于纽约，随后皈依了基督教。这一举动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轩然大

波，中外学者往往据此将奥登的思想和创作一分为二，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作为“奥登的心腹、掌故学家和注释员”，对奥登的这段描述很有代表性：

事既如此，现代艺术里就出现了二种趋势。一种是躲开看来如此反人性的，客观的世界而遁入个人的，私己的，晦涩的，怪僻的，及不关轻重的世界，另一是设法将想象生活与现代人人类所创造的广大而反人性的组织取得连系……这二种逃避与扩展的趋势时常平行地存在一个诗人的身上。在某些诗人中，扩展的阶段往往为逃避的阶段所接替。（袁可嘉译）

斯彭德在分析现代艺术的两种趋势的时候，把艾略特作为“逃避”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而把早期奥登作为“扩展”的绝佳代表进行诠释，这基本上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至于后期奥登是否彻底遁入了“逃避”，这其实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更何况斯彭德本人对后期奥登的解读也有一定的偏差。他在评论奥登的诗集《另一时刻》时这样写道：“奥登的诗歌之路堪忧……如果我被炸弹击中的话，但愿奥登能为我写几首萨福体诗。”众所周知，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善写歌咏情爱的浪漫抒情诗，斯彭德实际上是在暗讽奥登的诗歌题材越写越窄。一向心高气傲、不为他人言论所动的奥登，在读到好友的这番话后深受到伤害，还特地写去了一封长信。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国内外相关文章中看到类似“离开战争中的英国，去了美国”（参见王佐良先生的《英国诗史》）这样的句子，这未尝不是对奥登当年选择的一种情绪化回应。

那么，后期奥登真的“逃避”和“撤退”了么？奥登从来没有公开为自己辩护，却在实际行动中继续关注公共领域的事态发展，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和良知。以下两段内容摘自奥登写

给好友的书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奥登对自身的定位：

我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小说家，报道的事情与我无关。如果我返回英国，我所能预见的生活状况与我目前的美国生活没有丝毫差别，无非是阅读、写作和授课。

如果我确信自己足以担当士兵或者防空队员的工作，那么我明天就回去，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在军事上会有什么贡献。是因为我足够理智，或者仅仅是一种胆怯？我不可能给出答案。我唯一确信的就是，一旦英国政府需要我效力，我将在所不辞（我已经告知这里的大使馆了）。但是对于作家和教师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并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任何人都无法断言这个地方或者那段时间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出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美国最适合我，当然这也只有今后的所作所为能够给予证明。

奥登认为自己更加胜任的角色是作家和教师，而非冲锋陷阵的战士。虽然他在信中并没有直接反驳“胆怯”，但他一再奔赴战争前线的事实（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战，包括二战中为盟军服役的经历），在在都说明他远非一个胆怯者。对知识分子而言，只要他是一个知善恶、明是非的人，他的舞台便是无限广阔，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点。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他的信仰或者思想。不可否认，奥登在移居美国和皈依基督教之后，的确有“内倾”的趋向，他不再为社会变革而奔走、鼓呼，去充当临时伴奏者的角色，而是将目光更多地放在了与外在物质世界相对应的内在精神价值上面；将这种“内倾”趋向简单化地理解为“逃避”，无疑是一种极为粗暴的推断。

倘若对后期奥登的“所作所为”稍加体察和了解，我们会发现，他的创作与思想的成就已经有力证明了当初的这个抉择。

三

奥登一生笔耕勤奋，生前出版了二十多本诗集，还在戏剧、歌剧、散文等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就其诗歌创作而言，虽然丰富庞杂，却有如下几个重大主题贯穿始终：

一是探索主题。

奥登的诗歌中经常会出现“知识”、“学习”、“错误”以及“真理”、“历史”、“意义”等词汇，这些词很容易让我们看清他的旨趣和追求。对奥登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学说或思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始终不可弃守自身的独立价值判断；永恒不变的“真理”惟有人性的至善，其他种种不过是切入问题的角度。正因如此，奥登就像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位百科全书编纂者”，“喜欢搜集、分类和诠释大量的信息，力图将自然现象、精神体验、人类历史和潜在情绪融合成一个体系”。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奥登早年就写下了很多个人成长史题材的诗歌，无论是短诗里渴望挣脱“家族幽灵”（《家族幽灵》）、规避“迷失”（《迷失》）、变得“确定起来”（《流浪者》）的年轻人，还是组诗《1929》里走过春夏秋冬的“我”，抑或是诗集《演说家》里充满疑问、不断探索的“飞行员”，都在修读一门有关人生与生命的课程；而随着阅历的累积和智性的成长，那些颇带自传意味的抒情主人公显现出高度概括的“类”的性质，有时以亚当和夏娃直接命名，有时是抽象的“我”、“我们”或者“人类”，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思考着人类的命运，虽然充满危机感，对前景忧心忡忡，却并不绝望。诗歌《迷宫》就是个典型例子，在这首诗里，“无翼的人类”仰赖秉性中的进

取精神，向形而上学、神学、感官、数学、历史、美学、理性以及实证主义寻求帮助，坚韧不拔地探索着可能的出口。

二是战争主题。

奥登是真正属于二十世纪的诗人，他不断被卷入历史现实的波涛中，先后经历了一战、二战和东西方的冷战，这些外部事件无疑也在客观上丰富了他的阅历和创作。一战爆发时，奥登还很年幼，但他的父亲奥登医生加入了皇家军医部队，先后在加里波利、埃及和法国服役，与家里完全断了联系，战争结束后才返回家乡。在一战和二战中间的绥靖时代，奥登直接见证了法西斯势力的粉墨登场，在动荡时局和战火纷飞中，曾先后几次奔赴战争前线：1937年，奥登去了内战中的西班牙，写下了《西班牙，1937》；1938年，他远赴抗战中的中国，写下了《战时》十四行组诗和长诗《诗体解说词》；1939年移居美国后，虽然远离了英国，他却跟英国大使馆报备，还去了纽约征兵处（因同性恋被拒入伍），期间还写下了很多反思战争的诗作，流传最广的当属名篇《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而他那首《无名士兵的墓志铭》，则是铭记冷战的代表作品。这些写于不同年代的诗作连缀成清晰而坚定的人道立场，表明了奥登对战争摧残生命、泯灭人性的谴责，以及对战争合理性、正义性的质疑。

三是爱情主题。

门德尔松教授认为“奥登的早期诗歌，写的是热烈而短暂的爱欲”，而中后期的诗歌则献给了“婚姻”。早期奥登的确有如此倾向，无论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他的爱情诗里，我们都只看到了“热烈而短暂的爱欲”，而不是恒久的爱之连结。面对疏离的、乖张的社会，奥登一直认为恋人间的结合是一种有效的调和方式，但因为“焦虑的时代”（语出《焦虑的时代》）和“畸形扭曲的心”（语出《某晚当我外出散步》），这种努力却往往以失败告终。